

番薯引种考

梁家勉 咸经文

提要

一般称番薯为甘薯，不少人往往误认为至少在公元一世纪或其前就早为国人所利用和栽培，且已见于当时文献——杨孚《异物志》。通过一些文献证明：今天绿满大地，“与五谷并传”的“番薯”，与《异物志》著录的“甘薯”却截然二物。

番薯传入国境，并不很久，其传入的年代和途径，人们往往不尽悉或不尽详。通过初步考证，本文认为其传入的最早年代，应为万历十年即公元1582年（可能还稍早些），途径最少有三：一是从越南到粤境电白县；一是从越南到粤境东莞县；一是从吕宋到闽境长乐县。其中，除万历二十一年（1593）传入闽境一说，记载较多稍为人所知外，其它传入粤境的两路，知之者寥寥，系统为之考证的，尚付阙如。爰为文补其阙。

一提起番薯，顾名思义，很容易就联想到这种薯是从国外（番）引种来的。从引种初期起，一般评价相当高，认为是一种很好的植物——“嘉植”。

“诞降嘉植，山限水浔，既甘且旨，匪古伊今，壶餐以济，灾荒不侵……”这是当时闽人叶向高（1559—1627）¹⁾对它的歌颂，誉为“歉赖以济，民资以食”，是“国计民生之大利”。他还预测到“千百载下”番薯应与“五谷并传”²⁾。

今天，上距这种“嘉植”的安家落户仅及四百年左右，通过劳动人民的驯育和推广，由南至北，自东徂西，足迹几遍全国，不少地区，还流传“一季番薯半年粮”的谚语，在粮食上占相当重要的地位，历史上农作物之布局面貌为之一新。

番薯以味甘故亦称甘薯（Sweet potato），但与中土旧称的甘薯异。旧称的甘薯，最早著录于东汉杨孚《异物志》（一世纪八十年代前后）。因其同以“甘”名，后人往往误二者为一。实则旧称“甘薯”即粤称“甜薯”，系薯蓣科植物。学名*Dioscorea esculenta* (Lour.) Burk.，与属旋花科的番薯 (*Ipomoea Batatas* Poir.) 迥然两物。丁颖：《甜薯》（1928），《中国之甘薯》（1948），辨之已详³⁾（参见“图1”、“图2”）。

有如上述，番薯既与甜薯同有“甘薯”称，而称为甘薯的甜薯，早在公元一世纪已见记载，因而世人往往误把番薯的原产地也认为是在中国，连以研究中国植物见称的学者布累特什奈得（E·Bretschneider）都作如是观⁴⁾。但《栽培植物起源》（Origin of Cultivated Plants 1882）的著者德空多尔（A·De Candolle）则相信是美洲原产⁵⁾。根



图1 甜 薯



图2 番 薯

据番薯的自然分布和栽培历史，认为它出自新大陆是无疑问的。在横渡大西洋的哥伦布(C. Colombo)三次(1493、1498、1502)航行中才传播于旧大陆。所以，旧大陆有关番薯栽培的记载，一般都在十六世纪及其后，最先可能植于西班牙、葡萄牙等境，后来，随着麦哲伦海峡(Magellan Strait)的发现(1520)，渐次分别传至太平洋地区如印度支那和菲律宾群岛等地。由于新作物引种成功，各该国视同至宝，企图居奇，因而有些引种较早的国家，出现禁止出境的法令。

中国记载番薯的引种历史及其栽培法等的专题文献，以金学曾《海外新传》(1594)^①徐光启《甘薯疏》(1608)^②为最早，跟着，李渭《种植红薯法》^③，陈世元《金薯传习录》^④，陆耀《甘薯录》等书踵其后^⑤)。查所记载，除陆耀一书尚沿番薯既甘薯之说，误认为是古代原产外，余均相信它初由吕宋(菲律宾群岛之一)传入闽省长乐(闽侯县)，时在万历二十一年(1593)，由经手引种者陈振龙之子陈经纶呈报当时闽抚金学曾，金氏力为推广，教民树艺，闽人德之，因亦称为“金薯”。后人思其功，曾建祠纪念，称为“报功祠”或“先薯祠”^⑥)。这是确凿可据的史实，具见当时引种者五世孙陈世元《金薯传习录》和一些书志中。可以说，这是传入途径之一。但衡以当时国际交通

情况，番薯引种不只一途，可能有些湮没不彰。此外，可明确查知的，在广东境最少还有两路：

其一，是林怀兰由“交趾”（越南）国经陆路传入广东电白县（图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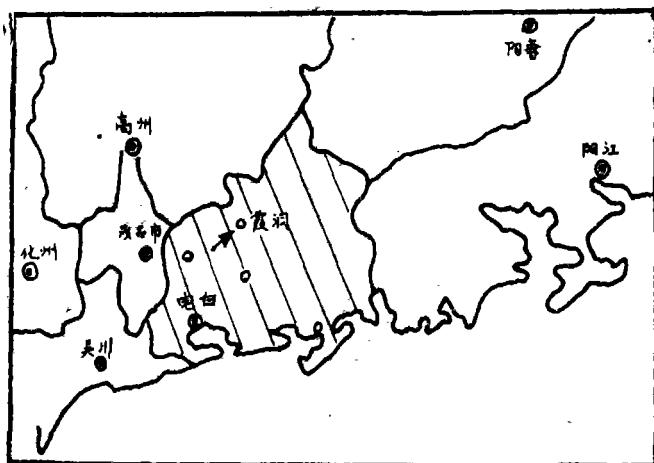


图3 电白·霞洞

据《电白县志》称：该县“霞洞乡有番薯林公庙，副榜崔腾云率乡人建立¹²⁾。相传番薯出交趾，国人严禁以种入中国，（违）者罪死。吴川人林怀兰善医，薄游交州，医其关将有效，因荐医国王之女，病亦良已。一日赐食熟番薯，林求食生者，怀半截而出，亟辞归中国……种遍于粤”¹³⁾。此事《吴川县志》纪载¹⁴⁾，基本相同，但发生在何年，则无明文可稽。今按：当林怀兰引种时，粤境尚无番薯栽植，故林氏不避风险，千方百计求其种。估计后此要经历相当长时期，才能达到“种遍于粤”，也才能受到后人尸祝，建庙纪念。据清康熙年间，吴震方《岭南杂记》所目击：“粤中处处种之。康熙三十八年（1699）粤中米价踊贵，赖此以活”。可见当时番薯距初莅国土时，历年颇久，意者在闽境引入前后，林氏不约而同，也引种于电白了。

其二，是陈益由安南（交趾）经水路传入广东东莞市。据东莞《凤冈陈氏族谱·陈益传》¹⁵⁾载：“万历庚辰客有泛舟之（往）安南者，公（陈益）偕往，比至，酋长延礼（招待住）宾馆，每宴会辄飨土产曰薯者，味甘美，公（益）覩其种，贿于酋奴，获之。未几，伺间遁归”。“及壬午夏乃抵家……以薯非等闲物，栽植花坞……（久渐）蕃滋，掘啖益美，念来自酋，因名番薯云。嗣是种播天南，佐粒食”。还得说明：（1）所提到的《凤冈陈氏族谱》是明·陈佐编，袁昌祚为之序。原版已佚，康熙间重修版，亦仅存孤本。尚幸此传已为康熙、雍正、嘉庆、宣统等版的“县志”所著录和引用。（2）序者袁昌祚，“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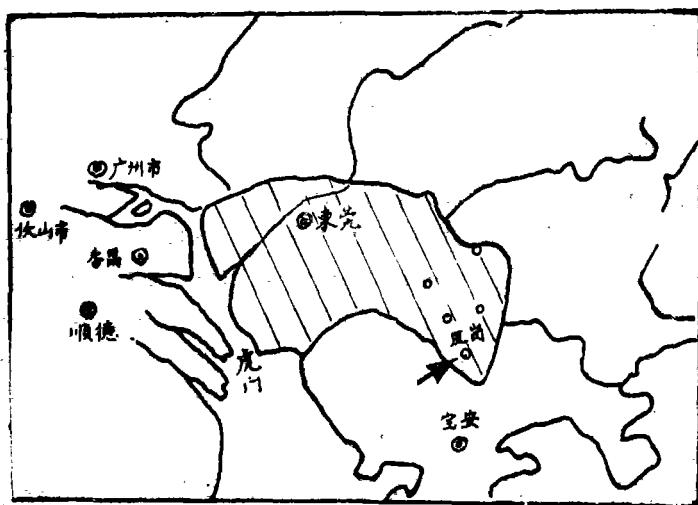


图4 东莞·凤冈

志”有传，隆庆五年进士，万历四十一年卒，年七十九。此部初版的“族谱”当编成于年前。（3）族谱记载陈益引种，明确称在万历庚辰往安南，壬午夏回抵家乡，则他引种到东莞时，盖在万历十年（1582），比陈振龙引入闽境早十一年。（4）陈益引种的番薯，据重修版族谱记载，最初只栽于住宅旁的花坞，至天启辛酉（1621），始于陈益祖坟附近租地三十五亩招佃植薯，以薯荐食，历代遵之。这两地（住宅和墓地），均在东莞凤冈乡境内，该乡位于今东莞市南部（属虎门公社），出海较近（图4）。其时上距越南莫氏王朝¹⁶不久，建立此王朝的莫氏，是广东东莞人，估计是时前后，东莞人来往越南境的较多，陈益是其中之一。陈氏引种于凤冈乡多年，直至天启改元后，才渐次推广。

综合来说，从番薯引种的历史角度看，有文献可征的，应以万历十年（1582）陈益引入东莞为最早；万历二十一年（1593）陈振龙引入长乐次之；至于林怀兰引入电白，虽未详其具体年，有些文献称为在明万历间¹⁷，估计应与陈益引入东莞时，相距不远。理由是：东莞与电白，地距非遥，同属粤境，同自一国引出。其初，可能彼此不相为谋，各引其种。后来，通过分别驯育和推广，才逐渐“种遍于粤”（《电白县志》）。溯其开始引种时，有如上述，两者时间必差不多，否则早引者势必越传越广，渐为遐迩所见所闻，而后引者必有所见闻，亦无需冒风险、犯禁再引了。由是可推知：东莞引入既在万历十年，则电白当亦在是年前后。后来，电白的“番薯林公庙”或称“番薯大王庙”¹⁸，独以庙貌巍然见称，疑其引种，或略早于东莞。果尔，则我国引种番薯的次第，应如次表：

引种次序	年代	引种地点	引种人	原始记载
1	万历十年以前 (1582以前)	广东电白县霞洞乡	林怀兰	《电白县志》 《桂平县志》
2	万历十年 (1582)	广东东莞市凤冈乡	陈益	《凤冈陈氏族谱》
3	万历二十一年 (1593)	福建长乐县	陈振龙	陈经纶《献番薯稟帖》见 《金薯传习录》

这里会提出这样疑问：从国外引种番薯，既然粤比闽早，为什么绝大部分的古文献，直至近人如丁颖的考证¹⁷，都说种来自吕宋，初殖于闽，而没有种来自交趾，初殖于粤的记载呢？理由只能推测：主要由于番薯入闽后，能及时获得推广机会，当时，职掌闽省政权的金学曾非常重视它，除饬令就地栽培试验，亲自撰文推广外，同时还有当地知名人士如叶向高、何乔远、谢肇淛、周亮工等为之宣扬²⁰，各地关心农事的学者如徐光启、王象晋等或为之传播至内地，或书之竹帛²¹，因而早就众所周知。至于番薯入粤，不过是平民间彼此互相授受，寂寂无闻。其行踪只沉埋于向不为人们注意的个别地志、族谱中，以致史迹遂晦。

此外，还值得附带一提：（1）关于地志、族谱一类文献（特别是族谱），一般人心目中往往不重视。在一般图书馆的库藏，只属无足轻重，甚至在挤压之列。实则从某些角度（如地方掌故、人口、物产、文物等方面）看，往往有其意想不到的重要作用。这些资料，总总林林，数量极多，质量参差不一，非一般图书馆所能备，但作为国家图书馆或省市重点图书馆，却责无旁贷，宜按照全国或本省市范围，尽可能兼收并蓄，待用无遗。例如上述记载番薯引种的“族谱”，就几沦于亡佚，如非当地的方志引用，则其史

实就将化为云烟。由是可见在历史研究中，对一些僻书僻典，不该轻易放过。（2）勤劳勇敢的我国劳动人民，长期来对农植物引种工作，做出不少巨大成绩，其中，冒风险，不远万里梯航的“海外赤子”——华侨，起的作用相当大，引种番薯就是其中一例。数典念祖，不容忘却！

附注：

1) 叶向高，福建长乐人，万历11年进士，历官礼部、户部尚书，东阁、文渊阁大学士，事迹见《明史》卷240。

2) 见叶向高《金薯歌》及其“引言”。

3) 丁颖：《甜薯》，见所著《作物名实考》第一部分（《农声》123期），1928年。又，丁颖、戚经文：《中国之甘薯—*Dioscorea esculenta* (Lour.) Burk.》见《中华农学会报》186期，1948年。

4) 见所著On the study and Values of Chinese Botanical Works(石声汉译本，1935年版，P.43)。

5) 见所著Origin of Cultivated Plants(1904, 英文版P.53—58)。又见：俞德浚中译本(1940版，43至46页)。

6) 见《金薯传习录》引，全文凡7则。

7) 原著已佚，今《农政全书·树艺》《群芳谱·蔬谱》及朝鲜徐有榘《种薯谱》均引及其部份原文。基本可见其原貌。

8) 原著系作者在山东布政使任内(乾隆15至18年)所撰，全文凡12则。

9) 传本极罕，福建省图书馆藏有乾隆33年福州小桥升尺堂利本及乾隆38年利本(残存下册)。华南农学院图书馆藏有手抄本。

10) 现存的有《赐砚堂丛书》、《昭代丛书》、《海粟楼丛书》等版本。

11) “报功祠”见陈文炅《明都御史金学曾报功祠记》(见《金薯传习录》)。“先薯祠”见郭柏苍《閩产录异》引《乌石山志》。

12) 按：倡建“番薯林公庙”的崔腾云，其生平见《电白县志·人物》，但不详其具体年代。据所著录的前后人物序次考之，似是乾隆间人。

13) 此据光绪18年版卷30“纪述”部份著录(民国35年修订稿油印本“杂录”部份同)。

14) 见光绪18年版卷10“纪述”部份。

15) 此谱原系明版，已佚。《东莞县志·艺文》著录题：“明·陈佐撰，袁昌祚序”，并全录其序文。其中《陈益传》(原题《素讷公小传》)是康熙重修版增入，该版现亦仅存孤本。据载：陈益字德裕，号素讷。

16) 东莞人莫登庸在越南称王，改元“明德”，系嘉靖16年(1537)事。

17) 《桂平县志·物产》：“薯……藤本一茎番薯。自明万历间，由高州人林怀兰自外洋携其种回。今高州有番薯大王庙，以祀怀兰为此(引种)事也。”(民国9年版。该版系以道光23年袁湛业等纂修本为底本)。

18) 见(注17)。

19) 见(注3)。

20) 何乔远浙江人，万历14年进士，官至南京工部右侍郎，著有《閩书》。事迹见《明史》卷242。谢肇淵闽县人，万历30年进士，官至湖广副使，著有《五杂俎》。事迹见《明史》卷286。周亮工河南祥符人，崇祯13年进士，曾官閩省八年，著有《閩小纪》，事迹见《碑传集》卷10。上揭何、谢、周等所著的书，都曾记述番薯引种入閩事。

21) 徐光启《农政全书》，王象晋《群芳谱》都曾述及番薯引种入閩过程及其栽培方法。而徐光启还曾在万历36年遣人在閩“三致其种”种之于上海。后在天津营田事，曾写“家书”询：“番薯畝岁收得几许？”同年另一“家书”说：“天津引种的‘番薯种只是难传’，认为‘可问’”。反映出徐氏对番薯在国内引种，曾做过一番工作。

INVESTIGATIONS ON THE INTRODUCTION OF SWEET POTATO

Liang Jia-mian Chi Chin-wen

Abstract

Long long ago, "Chinese sweet potato" (*Dioscorea esculenta* (Lour.) Burk.) was generally called "sweet potato". It was only a mistake that as early as the first century A. D. or prior to this, sweet potato was utilized and cultivated by Chinese and it was recorded in the famous then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named "Chronology of Rare Things" (I Wu Zhi, 异物志) authored by Yang Fu (杨孚). According to the veri-fication of some literatures, the "sweet potato" (*Ipomoea batatas*) is entirely different from the "sweet potato" described in the above mentioned literature, even though its emerald covers a good portion of the earth and is as vital as the other cereals to men.

It is not a very long time since "Fanshu" (*Ipomoea batatas*) was introduced into our country. Though the information concerning the date and channel of introduction is neither very exact nor in detail, yet after a preliminary investigation the authors at the present time prefer to believe that the earliest date of introducing should be the eighth year of Wan Li(万历) of the Ming Dynasty, i.e., 1582 A.D., or probably a little earlier. There were at least three channels of introduction; the first was from Vietnam to Dianbai County of Kwangtung Province; the second was from Vietnam to Dongguan County of Kwangtung Province; and the third was from the Philippines to Changle County of Fujian province. Among these three channels, excepting that during the twenty-first year of Wan Li(1593 A. D.), the last one of which more records could be found was better known by most people while first and the second ones were little known due to the limited the systemic evidences available.

As 1980 is the four-hundredth anniversary of the introduction of sweet potato into our country, the present paper is written to fill the gap in plant introduction history and to serve as a token of commemoration.